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难民危机：欧洲困境与挑战

□ 张 蓓

数日前，一张叙利亚三岁小难民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引发震动。尽管欧洲难民危机已发酵数月，仅因地中海船难导致的非法移民死亡就早已过千，但比起冷冰冰的死亡人数，这张照片真正展示了危机赤裸裸的残酷。非法移民不是欧洲的新问题，但近两年来，规模不断扩大，呈危机之势。2015年刚过半，欧洲的新增非法移民就达到30万，超过去年总和，而去年本身就是创纪录的一年。

照片背后的复杂图景

目前，危机的焦点从南欧的意大利、希腊转移到了临近巴尔干的欧盟东部国家。中东北非地区的非法移民主要有两条通道前往欧洲。一条是中地中海通道，即从利比亚出海，越过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另一条是东地中海通道，从土耳其坐短途轮船前往希腊，从希腊一路北上，穿过巴尔干地区非欧盟的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来到欧盟申根区的匈牙利。今年1月到7月有9万多人从中地中海通道非法入境欧洲，通过东地中海通道涌入了12万人。

尽管中国媒体一早使用了“欧洲难民潮”，英文媒体还是普遍冠以“移民危机”（migrant crisis）的说法。欧洲对“难民潮”这一说法的谨慎，有政治考量的结果，但也反映了移民成分的复杂。据欧盟外部边境巡防协调管理局Frontex的研究，非法入境的移民身份与其来欧洲的路径有很大相关性。中地中海通道主要是厄立特里亚人和尼日利亚人。从东地中海通道涌入的难民主要是叙利亚和阿富汗人。其中有逃离中东“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内战的难民，也有渴望在欧洲建立新生活的经济移民，甚至在同一个移民身上都存在逃离本国危险处境和寻求更好经济机会的双重需求。正是移民身份的复杂性给了欧洲政客逃避问题的借口，因为欧洲自认为有救助难民的道义责任，却普遍对经济移民采取强硬态度。早前，匈牙利总统欧尔班表示，这些人90%都是经济移民，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近日的演讲中也强调，当前移民潮中经济移民和难民的混杂。

此次危机展现了欧盟现有难民管理体系的漏洞。欧盟现行的都柏林体系将很大一部分难民处置责任交给难民最先踏足的欧盟国家，即地中海沿岸的前线国家。但在现实情况下，这一制度根本无法实行。一方面，前线国家往往最没有能力处置和接纳难民。意大利、希腊各有各的困难，难民登记形同虚设、难民安置点条件堪忧。另一方面，欧盟各国难民政策不同。瑞典的难民身份申请接收比例是77%，匈牙利为9%；德国对成年难民每月补助是374欧元，匈牙利为86欧元。这一巨大差异一定程度造成了“避难选购”问题。近日，一批滞留匈牙利的难民冲出难民营试图步行前往奥地利，德国单方面表态欢迎难民，更是彻底揭开了这一体系名存实亡的现实。

危机暴露欧洲一体化缺陷

欧洲一体化的缺陷也在危机中展露无遗。申根区一直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大成果。这一不设国界检查、人员自由流动的区域是欧盟原则和理想的体现。但申根区助长了危机扩散，欧洲国家无法阻挡涌来的移民。此次危机让很多人反思申根区的弊端。此外，在危机面前，各国都以保护本国利益为目标，有损团结。数月前，欧盟推动难民分配制度，以减轻意大利、希腊等国负担，但因为东欧国家和西班牙反对而没有通过。近日，在德国压力下，欧盟重提分配指标，代表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再次表达不同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也反映了新老欧洲深刻的鸿沟。波兰和斯洛伐克只愿意接收难民中的基督徒，匈牙利政府因在匈塞边境修建隔离网的政策饱受非议。造成中东欧和西欧国家鸿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经济实力、处理多元文化经验上的差异。中东欧国家政府福利开支、人均收入远不及西欧，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也缺乏接纳移民的管理经验和开放心态。

欧洲的矛盾实为道德困境

在来袭的难民潮前，欧洲的矛盾随处可见。在德国，一边是难民安置点纵火案频发，一边是慕尼黑火车站德国民众欢迎难民的暖心场景。就在不久前，英国人对难民潮的关注还只限于在法国加莱聚集、试图通过英法隧道入境英国的偷渡客，政府对难民潮没有表态和行动。直到近日来舆论转向，英国政府才承诺增加接收难民的数量。在北欧，瑞典民众走上街头支持收容难民；丹麦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在黎巴嫩报纸做广告劝说难民不要来。

这一矛盾展现了欧洲深陷的道德困境。各国内部对移民问题极为敏感。由于欧洲经济形势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对移民瓜分国家福利和工作资源不再大方，各国以“反移民”为旗号的政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威胁欧洲安全的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无一例外都与大部分移民所持宗教相同。尽管在欧洲，将恐怖分子与特定宗教以及该宗教的其他信徒混为一谈是政治不正确的做法，但这不代表偏见不存在，普通民众的安全担忧误伤了无辜移民。然而，欧洲并未抛弃对其价值的强调。欧洲以自由、平等、博爱自居，笃信其价值的一部分就是对弱势人群的保护、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欧洲国家不愿放弃道德高地，这也解释了在难民问题上欧洲国家“选择性”的道德。以英国为例，英国更愿意资助土耳其、约旦等国接收难民而不愿自己接收。在非接不可的时候，英国更指明只要叙利亚难民。



难民潮症结难解

难民潮的愈演愈烈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中东北非地区常年动荡，“阿拉伯之春”后旧疮未好，又生新疾——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人民流离失所。大批难民还在约旦、土耳其、黎巴嫩的难民营里等待救助，铤而走险前往欧洲的只是少数。近年来，难民总数不断上升、非法入境渠道日渐成熟等诸多因素交织，前往欧洲的难民从“细流”终于发展成各国难以招架的“洪水”。

难民潮再次证明，欧盟周边地区的动荡对欧洲带来巨大影响，欧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独善其身。周边地区的动荡和贫穷最终也要让欧洲付出代价。难民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解决。可是欧洲有意愿和能力吗？近日，英法已重新燃起扩大“伊斯兰国”轰炸行动的热情，以示意要从源头上对难民潮做出回应。可反思一年以来西方联军对“伊斯兰国”的轰炸行动，收效并不显著。面对地中海那头的动荡，欧洲需要拿出更多的政治远见和勇气。

时 评

欧洲难民危机 美国难辞其咎

□ 凌胜利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大批叙利亚难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周边的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国避难，使得周边邻国不堪重负，也引发了前往欧洲的难民潮。对于欧洲难民危机，美国的态度颇为复杂，欧洲则深受其害，其对欧洲关系、美欧关系、中东地区的影响更是深刻复杂。

美国难辞其咎。对于此次难民危机，美国难辞其咎。没有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中东发动的多次战争，中东就不会出现如此数额庞大的难民。相对于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则是不作为，结果导致叙利亚因内乱陷入“无政府状态”，“伊斯兰国”更是大行其道。叙利亚内乱不止，百姓流离失所，不得已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可是对于此次欧洲难民危机，美国的态度却令人不满，白宫发言人只言此为悲剧，值得同情，但并无具体实质性救济措施。对此国际社会的指责声音一片，普京、马杜罗等人厉声指责美国是罪魁祸首，欧洲盟友则抱怨不断，甚至美国国内也议论纷纷。前副总统切尼批评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乏力是当前难民危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美国确实应该对当前的欧洲难民问题负很大责任，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可谓适得其反，导致中东陷入权力真空，恐怖主义趁机兴起。4年来，叙利亚已产生难民400余万，占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欧洲深受其害。由于地理原因，难民问题最先都是邻近国家和地区受到影响。欧洲则往往是中东难民最愿意前往的地区之一。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今年跨越地中海进入欧洲大陆的难民总数已逾26万，其中希腊约16万，意大利10.4万。在进入希腊的难民中，叙利亚人最多，占82%。可以说，欧洲接收了中东绝大部分难民，而反观美国，过去五年只接收了1500余名的叙利亚难民。以往欧洲经济形势较好时，欧洲各国吸收难民的能力比较强，对难民的包容性更大，而如今欧洲一些国家并未从欧债危机中恢复，对难民更加敏感，排斥性更强。与此同时，难民中夹杂的恐怖分子更是引起了部分欧洲国家和民众的不安。

欧洲内部三重分化。面对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欧洲内部出现了穷欧洲与富欧洲、边境国与内陆国、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三重分化。一是由于欧洲国家应对难民的能力不一，穷国和富国对待难民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德国、瑞典、法国等富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愿意竭尽全力解决难民问题，但匈牙利、波兰等穷国则并不支持扩大难民接纳数额，更不愿意承担欧盟框架下的难民负担。二是由于中东难民主要经欧洲边境的沿海国家或巴尔干国家进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这也使得欧洲边境国家因承担过多的难民而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如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等国家领导人就明确表示了让几个边境国家承担过多的难民问题有失公平。三是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存在巨大分歧。老欧洲国家大国面临着老龄化所引发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因而过去在难民问题上相对开放，有时也将难民作为经济振兴的工具，而新欧洲则基本不存在劳动力匮乏的问题。相反，大量难民的涌入与他们的工作机会形成了竞争，这也成为他们抵制难民进入的重要理由。

美欧关系分化。当今欧洲难民危机与美欧的中东政策有很大关系。尽管美国被视为罪魁祸首，但欧洲一些国家则是帮凶无疑。部分欧洲国家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导致中东局势混乱，难民问题凸显。事实上，当前的欧洲难民问题是欧洲在替美国承担责任，这也迫使一些欧洲国家要求美国接纳更多的叙利亚、中东难民，但美国的态度却令人失望。如此将会造成的问题是，未来欧洲在中东问题上还会继续支持美国吗？大西洋的裂缝会否就此加深呢？

中东混乱。相对于欧洲而言，中东地区才是难民问题的最大受害者。自叙利亚内战以来，其几个邻国接收了大量叙利亚难民。如今在黎巴嫩，每5个人里就有1个叙利亚难民，这使得黎巴嫩几近崩溃。而实力更为强大的土耳其也逐渐不堪重负。如果听任难民问题掏空中东，将会导致持久而深远的危害。中东将成为世界的动荡之源和灾难之源，世界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美国也很难独善其身，其大中东计划更是遥遥无期。

美国需要尽力补救。显而易见地是，美国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做得远远不够，其接收的叙利亚难民只占叙难民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未来亦难见有大的改观。尽管国际社会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但美国不为所动，仅仅承诺今年年底前再接收1500名难民，与此同时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难民。对于美国这种吝啬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事不关己，不必太在意。难民问题目前主要影响欧洲和中东，美国本土所受影响不大。二是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收缩导致不作为。三是担心难民中的恐怖分子混入美国本土。但袖手旁观并不能解决问题，美国应该积极作为。

世界经济是否复苏仍待观察

如果没有科技的突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难以阻止全球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新的科技将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就业，这才是世界经济增长新的能量与动力。

□ 文 洋 窦玉根

世界经济复苏了吗？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负增长之后，世界经济经过2010年、2011年5.4%和4.2%的回调，连续三年维持在约3.4%的增长率，对比危机前5%左右的增长率而言，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这是全球经济已经降低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复苏前的低迷阶段，仍待观察。

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动力。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逆势上扬，从2013年开始，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在2014年占全球GDP比重达到56.9%。目前，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放缓，从2010年至今增速连年下调，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波动，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拖延。尽管如此，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近三年约5%的平均增速是发达经济体的三倍多，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14年仍高达四分之三。

美国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的领跑者。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超出前三年2.2%的平均值。从就业来看，美国的失业率连续下降，自2009年的10%降至2015年7月的5.3%，几乎接近美国政府认可的5.2%的水平。国内市场环境的升温，使美国消费者及企业信心得到增强。诸多有利条件为美国稳步复苏提供保障：能源价格下跌、通货膨胀温和、货币政策宽松、财政负担减少，以及房地产市场改善等。

欧元区的情况就没有如此乐观，金融危机后六年中有三年经济增长率为负，2014年的增长率勉强维持正增长，仅0.9%。较高的实际债务负担、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投资者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大大抑制欧元区需求。希腊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正在持续发酵，俄罗斯及乌克兰局势雪上加霜，增加了其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但是，欧洲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表现良好，如英国、瑞典、瑞士等正步入稳固复苏。

日本经济表现令人失望。201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消费疲软，投资不振是其经济低迷最重要的原因，特别是2014年4月日本提高消费税后，造成了严重的消费收缩，导致2014年日本经济负增长，仅为-0.059%。而超高水平的国债、生产率增长下降、企业税负过高、农业改革进展缓慢等，可能将加剧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中国继续对世界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是中国经济从超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的必然表现，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无止境的下滑，而是在“换挡期”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尽管IMF对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为6.8%，但仍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不是经济萎缩，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符合客观规律。

其他新兴经济体表现存在差异。印度经济增长强劲，增长率从2012年的5.1%上升至2014年的7.2%，IMF预测2015年印度的增长率将超过中国。但是巴西和俄罗斯的表现不佳，其2014年的增长率分别为0.1%和0.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收紧、私人投资不振、干旱等因素对巴西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而油价急剧下跌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主要依靠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不容乐观。

现阶段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两个关键因素有密切联系，即石油价格与汇率。国际油价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下跌至今仍处于低价震荡，比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更快，油价下跌的原因很多，如石油需求减弱、供应量增加及能源效率提高等。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影响了世界收入的分配，有利于对石油进口国的增长，而不利于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活动，总体上对全球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而汇率变动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汇率从2014年下半年至今大幅波动，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已上升约10%，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相比实际升值达到14%。汇率变动重新调整了各国需求，将需求转移到那些经济更困难、政策空间更小的国家，进而有利于全球经济。但是，汇率急剧变化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导致本币贬值国家的外币债务迅速上升等。

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要素人口与投资并不乐观。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存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65岁以上人口就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每年约有50万人步入老龄化。而随着2011年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员开始退休，美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根据美国统计局预测：2030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20%左右。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同样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将呈现出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老人规模大、劳动力红利消退、社会抚养负担日益加重、养老资源缺乏等问题。

全球私人投资市场整体低迷。在金融危机期间受重创后，发达经济体私人固定投资一蹶不振，其他地区投资增速也普遍放缓。发达经济体2008年至2014年私人投资与2007年初危机前做出的预测相比下降了25%，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投资占资本存量的比重近年来也有所下滑，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都低于繁荣高峰时期做出的预期。比较糟糕的结果是，私人投资偏低导致多个经济体的潜在产出下降。虽然住房投资在危机期间大幅下降，但商业投资巨幅缩减才是投资下滑最主要的部分，由此造成危机后全球经济活动的整体低迷。除了低迷的经济形势外，融资约束和政策不确定性也大大抑制了危机以后的投资活动，不论企业的商业前景如何，缺乏资金来源将制约商业投资的扩大，而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未知风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形势。2014年，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到“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崛起，从美俄对立到中日关系紧张，不断涌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对世界经济复苏形势构成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制约。主要关注全球债务和财政问题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罕见地发表报告称：“地缘政治风险将是2015年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第一次如此深刻地影响全球命运。而不断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中东、非洲一些国家爆发的地区冲突，以及债务危机对欧盟内部的撕裂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全球债务上升威胁全球经济复苏。日内瓦世界经济报告显示2001年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60%，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这一比例约为200%，而2013年这一比例再升至215%。然而，美国的债务问题正有所改善，2014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经降至2.8%。但欧元区的情况甚为严重，其各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15年首季度平均达到92.9%，债务水平创历史新高。希腊债务相当于该国年度GDP的169%，意大利、比利时、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政府债务也都超过经济产出的100%。而在许多国家，由于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使降低公共债务水平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目前全球利率水平已经总体低落，如果一旦出现全球杠杆危机，资产价格下跌，信贷紧缩，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目前，已经存在低利率、低通胀与高债务并存的现象，制约了后续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此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争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地区合作主导权的争夺都为世界经济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摆脱种种不利因素绝非易事，劳动力、资本等经济增长要素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如果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真的下降，那么依靠科技创新可能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一波的科技革命，如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利用、农业的现代生物技术应用等，通过科技创新将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没有科技的突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难以阻止全球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新的科技将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就业，这才是世界经济增长新的能量与动力。

世界经济